

## 何立峰在四川调研时指出

##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持续增强经济发展动能

新华社成都6月28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6月25日至28日在四川调研。何立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增强经济发展

动能。

何立峰先后到四川成都、德阳、绵阳等地,深入了解相关装备制造和专精特新企业科技创新、外贸出口、项目建设等情况,实地调研陆港型物流枢纽运行情况。何立峰强调,要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发挥好大国重器的牵引带动作用,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

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要强化各类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强产学研融合和国企民企合作,积极打造优势产业集群,加速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改造,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何立峰指出,要进一步深挖对外贸易潜力,充分发挥中欧班列和西部陆海新通道作用,更好服务内陆开放高地建设,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持续盯紧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工作,有效维护地方经济金融稳定。

何立峰要求,有关部门要深入分析地方和企业反映的共性问题,及时研究储备相关政策措施,全力推动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 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 中央纪委办公厅

## 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日前,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

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

-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2024年,南宁市对以前年度无偿划给3户市属国有企业、已用于公益性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的15宗土地,直接修改《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将决定书中原本为0元的“划拨价款”,修改为84万元至5亿元不等,再向3户企业收取所谓“划拨价款”。财政部门在收到3户企业用自有资金上缴的“划拨价款”并计入财政收入后,再以征地补偿款名义返还企业。如此循环空转,其中1宗土地最多达18次。通过上述方式,南宁市共虚增2024年财政收入28.3亿元。

- 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2024年5月,酒泉市新城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为建设体育公园水系景观工程,在明知该项目未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也未按要求编制内涝防治设计文件的情况下,通过将“伴行步道”

包装成“检修路”、将“水系补水”项目包装成“水污染治理”项目等方式,将体育公园水系景观工程包装为“雨洪行泄通道及水污染治理”工程,申报并获得城市地下管网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5595万元。2025年底工程完工,其中动用3816万元修建的种植岛、观景平台等景观工程,不仅未实现建设目标,反而严重妨碍雨洪行泄功能发挥。

-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2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2022年以来,杭州市萧山区安排所属2家融资平台通过虚构合同、虚增资产价值等方式向金融机构融资,实施市政道路、征地拆迁、环境改造等公益性项目,形成大量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其中7.38亿元是锁定2023年3月31日存量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后又违规新增的。2024年12月,杭州市萧山区在上述隐性债务未清偿的情况

下,向上级政府部门虚假报告2家融资平台隐性债务已全部清零并退出,影响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政策落实成效。

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

(上接第一版)

我国农业生产场景复杂多样,对智能农机适应性、定位及规划能力提出极大挑战。农田数字化基础设施薄弱,丘陵地区通信网络差,“田不宜机、艺不适机”问题突出,严重制约智能农机规模化落地。赵剡水建议,围绕平

原地区、丘陵山区及设施农业等作业场景,推出一批成熟可靠的新型智能农机产品,并通过“新基建”提升田间通信覆盖与数据采集能力,补齐数字化短板。

针对农机产业“多、散、小”,部分企业研发投入不足、维保技能难以匹配智

能化需求等问题,赵剡水建议,分类培育龙头及专精特新企业,支持生产线数字化转型,建强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滴滴农机”式远程运维与共享模式,完善标准、检测、认证体系及中试验证设施,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对智能农机重点倾斜,加强国际合作,通过双循环提

升产业能效。

业内人士表示,智能农机是农业现代化的新引擎,也是智能经济发展的新蓝海。农机行业需抢抓机遇,把握时代红利,在新一轮产业革命大潮中占据领先地位,为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上接第一版)

##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不是二元对立,而需统筹兼顾

当前,有部分地区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简单割裂,较为突出的是“重物轻人”倾向,热衷于上项目、建园区、购设备,而不关注这些投资是否与人、人的需求和人的发展相匹配。这类现象并不鲜见。如,有的地方不充分考虑消费者实际需求,当地没有多少古迹资源,却斥巨资人为打造古城古镇,结果沦为“空城”“鬼城”;有的地方花费数千万元,将不具备打造A级景区基础条件的小山村,包装申报国家4A级旅游景区,最终烂尾摆荒;有的地方花重金购买先进设备,但忽视配套培训与流程再造,陷入设备闲置、无人操作使用的困境。

人的发展与物的投入之间存在内在联系,二者相互制约、相互转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力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和生产资料相结合而形成的改造自然的能力;社会再生产不仅包括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也包括劳动力的再生产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物质生产资料是劳动得以创造价值的客观条件,没有设备、厂房、电力、交通等“物”的投入,劳动者的劳动无法落地,劳动力价值无从实现。但物本身不能创造价值,只有劳动者运用生产资料,才能完成生产、创造新价值。生产资料的技术含量越高,对劳动者知识、技能、创新能力的要求就越高。随着生产力进步,生产资料投资正加速向智能化、无人化方向转变,而劳动越来越多地从体力劳动转向脑力劳动、创新型劳动,这进一步要求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互协调、更好结合。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道器合一”的思想,对今天处理好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关系很有启发。如,器以载道、物以致用强调器物既是物质功能的载体,也是文化精神的象征,二者相辅相成;器以藏礼,礼以育人深刻揭示了中国传统礼乐文化中物质载体、精神规范与教化功能三者之间辩证统一的关

系。可见,物的投资,不仅为人提供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条件,而且为人的精神、社会文明提供了实物载体。

投资于物无疑是很重要的,如果物的投入不足,人在生产中发挥作用以及人自身的发展都会缺乏物质条件,人文精神也会缺乏物质载体。但如果“重物轻人”,物的投入不是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必然导致资源配置失衡、投资缺乏效益、发展效能低下,造成经济社会发展后劲不足。

“重物轻人”倾向的产生是粗放发展模式的惯性思维使然。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加强物质资本投资,大规模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设施投入和物质要素积累,有效扩大了生产供给、完善了产业体系,对推动经济实现快速增长、提升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人口结构发生深刻变化,过去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和物质资源投入的传统发展模式难以维系,必然要求发展动能从要素驱动、规模扩张转向创新驱动、效率提升。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正是针对新问题新挑战的主动应对之策。一方面,要求改变“重物轻人”的状况,将更多资金投入用于教育、民生、社保等领域,把“人口红利”转为“人才红利”。另一方面,要求物的投资应当有利于人的发展。如,通过增加图书馆、科普馆、体育馆、社区活动中心、乡村文化广场等的建设投入,让群众无需付费或少付费就能提高自身文化素养和身体素质。强调投资于人的重要性,并非弱化或否定投资于物的价值,也不是搞脱离发展实际的高福利,而是要既见物更见人,注重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统筹兼顾和协调联动,共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

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更好统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大有可为。如,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优化

人居环境、完善便民休闲娱乐设施;促进人的能力提升,需要推动基础科研平台和科技基础设施智能升级;城市更新,需要贴近民生需求,在精细化、智能化、人性化上下更大功夫;等等。让物的投入服务于人的发展,让人的进步反哺物的升级,必将形成“1+1>2”的强劲合力。

## 投资于人不等于高薪挖人,而应潜心育人

在具体谋划推进投资于人时,有的地方或企业将其片面理解为高薪挖人,甚至发展为激烈的“抢人大战”。如,开出天价薪酬或特殊待遇,引进戴着各类“帽子”的人才;忽视人才结构与产业需求的匹配度,追求人才流入的数据增长;更有甚者,个别经济落后地区为引才聚才盲目跟风,承诺高额补贴,不惜透支地方财政。

高薪挖人虽能短时间内堆砌高端人才数量、博取亮眼数据,却衍生出多重深层隐患和长期问题。一是形成挤出效应,不利于人才普遍成长。将大量公共财政资源倾斜于少数“戴帽子”群体,必然挤压基础教育、科学研究等普惠性、长期性投资的预算,挤占普通人才、基层从业者的资源,打击本土人才、青年人才积极性,出现“外来高薪、本土冷落”“有钱抢人、无钱育人”的怪象。二是引发虹吸效应,加剧发展失衡。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相比,经济实力雄厚的地区能够利用财政优势吸引高端人才,这种虹吸效应会进一步拉大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三是可能出现引而不用,导致人才浪费。有的地方由于缺乏配套产业平台、科研条件或职业发展空间,导致耗费巨资引进的人才被闲置;或由于缺乏科学公正的绩效考核与激励机制,个别引进的人才享受高待遇却低产出,这种反差与不公有可能影响整体积极性。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复杂,至少有两个方面值得深思。一方面,“任期型政绩观”与人力资本投资的长期性存在矛盾。人才培养的回报周期往往较长,难以与地方官员的任期相匹配,常见的考核机制也倾向于采用易于量化、快速见效的指标。另一方面,人才评价的狭隘化与市场需求的多元化存在矛盾。许多政策仍固守“唯学历、唯职称、唯帽子”的惯性思维,将大量资源集中于少数标签化的精英人才,却忽视培养支撑实体经济所需的应用型、技能型人才。

实际上,相较于高薪挖人,各地潜心育人,构建梯队化的人才供给体系才是解决人才来源问题的更好出路。为此,应夯实基础教育,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做强职业教育,针对产业升级对技能人才的巨大需求,大力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让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推动高校和应用型本科院校紧密对接区域发展需求,办好科学专业教育,并鼓励其与本地企业共建研发平台,促进科研成果就地转化。

同时,还需建立以能力和贡献为导向的评价机制,更加注重人才的实际能力、岗位贡献和产业发展适配度,让扎根一线的工程师、技艺精湛的工匠都能获得应有的尊重与激励;搭建开放共享的创新创业平台,为各类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提供低成本众创空间,完善融资、法律等服务,让创意便捷地转化为可行方案、得到资金支持;给予尊重人才、宽容失败的社会文化,给予创新活动更多的包容和耐心,形成有助于人才成长的良好环境。

人才培养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慢功夫和“笨功夫”,必须坚持长期主义。地方和企业唯有从“拼补贴、抢人才”的短期焦虑中解脱出来,结合自身发展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长远规划,用好人才存量、培育人才增量,才能充

浙江义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近年来到的人常常惊叹:这里有210多万种商品,与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往来贸易。

曾经,伴着阵阵鼓点在街头巷尾响起,义乌农民肩挑糖担,以糖换毛,归田肥地。今非昔比。习近平总书记称赞说:“义乌小商品闯出了大市场、做成了大产业,走到这一步很了不起,每个人都是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

发展并非一路坦途。1982年,当地农户冯爱倩因摆摊被查处,她当街拦住时任县委书记谢高华,直问“为什么不老百姓摆摊?”

这一问,问出改革的先声。几个月后,义乌顺应改革开放大潮,作出大胆决策——开放“小商品市场”。冯爱倩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营业执照的持有者之一。

思想的枷锁一日未解,改革的脚步便难以大步向前。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这番话犹如一声惊雷,驱散了人们思想上的迷雾,照亮改革的前路。

同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作出重大决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国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目的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

曾经响于南海之滨的春雷,于此刻在神州大地上激荡。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勾画出基本框架: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

集中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全国呈现改革开放全面推进、经济建设迅猛发展的蓬勃景象:1993年我国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3万亿元大关,比上年增长13.9%。

一路“摸着石头过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市场化程度大幅度提高,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稳步崛起。

如今,冯爱倩的孙辈接过奶奶手中的“拨浪鼓”,用一张张跨境电商订单,续写着“鸡毛换糖”的新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实践中探索、在认识中深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市场与政府关系的科学定位提出了更高要求。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重大论断: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

一词之变,是认识的飞跃,更是改革的深化,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那一声声激荡神州的时代春雷,依然回响在中国式现代化征途之上。

(新华社北京电)

戏”并不鲜见。长期以来,在民生领域,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往往由政府一肩挑,形成了对政府的路径依赖。企业投资通常强调资金高效运作,追求利润最大化,与人力资本投资的长期性存在矛盾。而一些社会组织又因参与中发挥作用。当前,政府“单打独斗”的做法已无法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投资于人通过提升人的知识、技能、健康水平和社会适应性,将人力资源转化为可持续增值的人力资本,涵盖的领域也极为广泛,贯穿全生命周期,包括生育养育、成长教育、社会保障、技能培训、健康与养老等。这样关乎千家万户、涉及千行百业的战略之举,仅靠政府一己之力,显然不够。

众人拾柴火焰高,投资于人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政府可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加强顶层设计、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为多元主体参与创造良好环境;企业是创新主体,依托自身资源优势,能够在职业培训、为高校提供实习岗位等方面发挥作用,助力劳动者技能提升与高质量就业;社会组织是联系政府、企业和市场的重要纽带,在提供公共服务、推动资源共享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可弥补政府和市场的不足;家庭和个人既是投资于人的受益者,也是参与者,在养育子女、保障生活起居、开展启蒙教育、维系身心健康以及学习提升、职业规划、自我增值等方面,能够发挥独特作用。因此,实现人力资本的持续增值与高效转化,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家庭、个人唱好“大合唱”。

总的来看,对投资于人的认识误区形形色色。研判误区产生的原因,既让某些错误政绩观“现了形”,反映出对投资于人理解不透、方法失当、路径不明等问题,更凸显出树立系统思维、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的重要性。正本清源、纠偏定向,跳出浅层化、功利化、碎片化的认知局限,深刻把握投资于人的时代内涵与实践要求,有力消除影响投资效能的“梗阻”“痛点”,才能推动我国教育优势、科技优势、人才优势转化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优势。

新华社记者

吴晶

彭韵佳

郑可意

## 走出对“投资于人”的认识误区